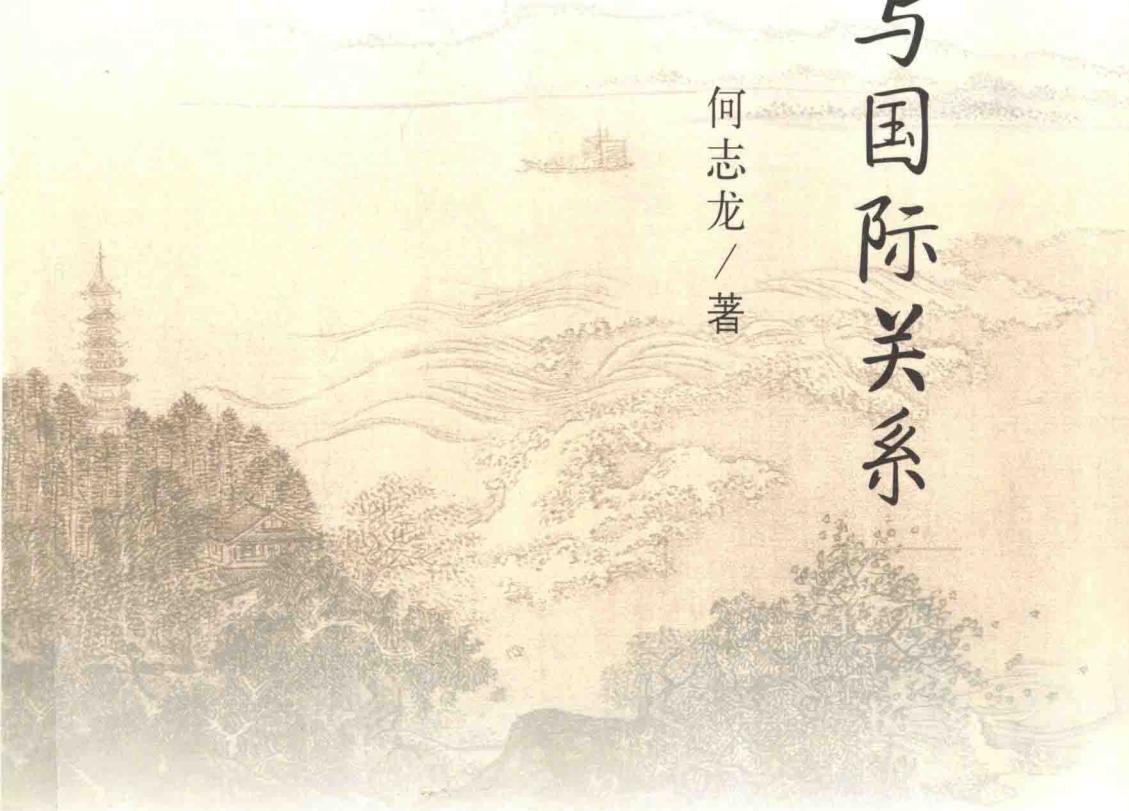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丛书主编 / 何志龙

中东历史与国际关系

何志龙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丛书主编 / 何志龙

中东历史与国际关系

何志龙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历史与国际关系 / 何志龙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

ISBN 978-7-03-047016-4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中东—历史—研究②中东问题—中美关系—研究

IV. ①K370.7②D815.4③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8563 号

责任编辑: 陈亮 任晓刚/责任校对: 李影

责任印制: 张倩/封面设计: 黄华斌 陈敬

编辑部电话: 010-64026975

E-mail: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3/4

字数: 320 000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丛书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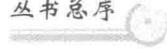
在高等院校，教学与科研是一般教师关注的主要对象，教师们不仅关注自身的教学与科研，也关注他人的教学与科研，但对于学校和学院，高度关注的则是学科，即我们通常讲的学科建设。所谓学科建设，一般包含学科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学科平台建设，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设置和建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设置和建设，另外也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设置和建设，以及其他各类研究平台的设置和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主要指师资队伍的规模、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方面。科学研究，主要指师资队伍成员从事学术研究所产出并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学术论文、著作以及研究报告等。人才培养，主要指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质量及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和社会各行业的影响。学科建设的四个方面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学科建设的有机整体。其中，学科平台是基础，有了学科平台，有利于引进人才和加强队伍建设，有了学科平台，才能招收研究生，进行人才培养。队伍建设是核心，拥有一支合理的师资队伍，才能支撑和维持学科平台，才能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体。科学的研究是关键，科学的研究成果体现学科平台的力量，也是培养人才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较强的科学的研究能力，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人才培养是目标，人才培养必须依托学科平台，同时，人才培养不仅必须要有师资队伍，而且必须要有具备科学的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才能完成合格的人才培养。

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历史学科一样，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在2012年之前，主要进行的是学科的外延建设。所谓外延建设，就是指增加学科的数量和规模，如拥有几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几个国家重点学科以及几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综合国力的

增强，民众对高等教育有更高期待，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道路，高校学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学科建设的重点由外延建设转向内涵建设。外延建设主要强调量，而内涵建设则更加注重质，外延建设为内涵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已有学科平台的基础上，凝练高水平的队伍，产出高水平的成果，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将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统领这三方面的正是学科特色。凡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大学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学科特色上。所谓学科特色，主要指在某一学科的某一领域，凝练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产出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同时培养出一批在学术界和相关行业有影响的人才。为什么说学科特色是学科内涵建设的灵魂，原因有三：一是从人力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撑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二是从财物资源配置看，很难有一个高校有能力支持一个学科（一级学科）所包含的所有学科领域发展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支持学科建设不仅要有研究团队，而且要有为研究团队提供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财力和物力，如从事历史学研究所必需的场所设施、网络环境和图书资料等，只有满足人、财、物的合理配置，才能进行科学的研究。三是只有发展学科特色，资源配置才能实现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如果学科领域广泛，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必然广泛，相应地如果学科领域相对集中，需要配置的文献资源也相对集中，成本低而利用率高。另外，发展学科特色，易于承传学术传统，易于形成内部合作，易于产出系列成果，易于团队培养人才，易于形成学术影响，也易于保持学术影响。

发展学科特色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作为历史学科建设，要充分考虑地方历史文化，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这种优势既能更好地服务地方，也能充分彰显自己的学科特色。要注重已有学术传统，顺应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着眼未来，长远规划学科特色。要充分考虑学校的实力地位，谋划学校能够实现的规划，因为学科建设规划只有在人、财、物的可持续投入基础上才能实现。

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依托地处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中心，考古资源丰富，出土文物规格高和数量大的优势，经过几代历史人 70 多年的不懈努力，逐步形成了以周秦汉唐历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学科特色，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获批，也是对这一学科特色的充分肯定。随着国家对历史学科精细化分类管理，原来既是门类也是一级学科的历史学一分为三，调整为中国史、世界史、



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根据学校地位的变化和学校对历史学科人、财、物的持续投入状况，面对三个一级学科的评估和建设，在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思路必须明确，决策必须正确，行动必须快捷。环顾国内外高等院校学科建设成功者，无不具有显著特色。我们在学科内涵建设中，特色发展是唯一选择。作为中国史一级学科，其统属的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学两个国家重点学科，是我校的特色学科，也是我校的优势学科，在国内学科建设的激烈竞争中，只有加大建设力度，才能保持优势地位。而要保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地位，除了加大已有建设的力度，还必须不断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才能进一步强化学科优势，彰显学科特色。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发展的大战略，为地处丝绸之路起点的我校历史学科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学院“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不仅顺应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同时也是我院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的体现。中国史升格为一级学科后，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势在必行，而从时间和空间上看，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样极为广泛，我们也必须选择某一领域，重点建设，特色发展。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西北地区的近现代史作为我校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方向，同样具有明显的地域优势，也必将成为我校的学科特色和新亮点。

此外，文物与博物馆学也是学院谋求学科建设发展特色的一大发力点。2008年1月23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博物馆已成为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博物馆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但博物馆学的专业人才却明显不足，这就为高等院校博物馆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陕西是考古大省、文物大省，更是博物馆大省，博物馆的人才需求也相对较大。基于地缘优势和省内学科建设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我校在考古学学科下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陕西省文物局与我校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家文物局在我校设立文博人才培训示范基地，充分说明我校重点发展博物馆学符合陕西省和国家对博物馆人才培养的需求，特色建设博物馆学的思路得到了肯定和支持。我们将在国内博物馆学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吸收国外博物馆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

索努力构建我国博物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彰显我校博物馆学的学科特色。

彰显学科特色的要素很多，但产出颇具影响的系列研究成果尤为重要。为此，学院设计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史学丛书》。本丛书首批 17 本，均为学院教师近年新作，每本书的内容不少于三编，作者自序。丛书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希望通过出版本套丛书，集中展现学院教师近年来学术关注的领域和成就。鉴于本丛书是在我校大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开启之年规划完成的，故以一流学科建设的思路代为本套丛书之总序。

何志龙

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文汇楼 C 段 209 室

2015 年 12 月 25 日



目 录

丛书总序 i

第一编 中东研究概论 1

- | | |
|--|------------------------------|
| | 国外中东研究回眸 3 |
| | 史学理论的新视野——《文明交往论》读后 17 |

第二编 塞浦路斯历史与加入欧盟问题 21

- | | |
|--|--|
| | 移民活动是早期人类社会历史交往的普遍形式——从历史交往看移民与塞浦路斯早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23 |
| | 论塞浦路斯鲁西格南王朝的交往性特征 30 |
| | 犹太人与基督教在塞浦路斯的传播及其影响 41 |
| | 外来移民与塞浦路斯的民族形成——兼述塞浦路斯历史上希腊族人与土耳其族人的关系 46 |
| | 塞浦路斯振兴经济之路 57 |
| | 塞浦路斯加入欧盟进程探析 68 |
| | 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原因 83 |

第三编 中东国家关系 99

- | | |
|--|--------------------------|
| | 伊朗视野中的以色列 101 |
| | 20世纪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评析 110 |



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	123
叙利亚与两伊战争	131
霍梅尼时期叙利亚与伊朗关系	148
塞浦路斯问题初探	159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科威特及其外事	174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历史探源	179
第四编 大国与中东关系	195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大中东计划”	197
后冷战时代叙利亚与美国关系	208
冷战结束后伊朗与美国关系	218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退”与“进”	228
第五编 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	239
中国与塞浦路斯关系	241
以色列农业现代化成功经验及其对陕西农业发展的启示	251
以色列农业教育对陕西农业发展的启示	265
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及其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274
中亚“颜色革命”的根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282

第一编 中东研究概论



国外中东研究回眸

作为人类文明摇篮的中东地区，曾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的产生地，在这块肥沃土地上孕育的独特的伊斯兰文明，与亚欧其他文明曾发生过激烈地冲突、碰撞、相互融合和促进与发展。但随着西欧的崛起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阿拉伯大帝国的衰退，中东地区成为西方列强蚕食的对象，尤其在 20 世纪初当中东地区发现丰富的石油资源后，列强们更是争先恐后向中东渗透，为了配合列强政府对该地区的征服与殖民，对中东地区的研究也便成为西方学者的一项重要课题。但随着包括中东各民族在内的东方民族的觉醒及对西方殖民统治和民族独立地实现，从而打破了以欧洲中心论为主体的西方学者对中东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东籍的学者们逐渐开始以自己特有的文明和视角，重新审视西方学者对中东的研究，并开始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本文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探视 20 世纪西方和中东籍学者们研究中东的论著、方法论和指导思想的演变与发展，为我国中东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东方学，即对东方文明的研究，产生于 18、19 世纪，是伴随着欧洲研究圣经、古代中世纪史、科学和哲学及对世界其他地区兴趣的激增逐渐出现的。东方学一词，在英文中最早出现于 1779 年，而在法文中最早出现于 1799 年。^① 东方学家把研究宗教和对经典著作手稿语义上和语言上的研究作为重点，他们试图通过对宗教和语言的研究，寻找这种独一无二的伊斯兰文明的基本特点。如研究“伊斯兰城市”，就可能从研究经典中的词句如阿拉伯语中的“城市”即

^① Maxime Rodinson, Europe and Mystique of Isla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p. 57.

“madina”一词开始，该词源于阿拉伯语中的“din”，即宗教之意，进而可推断宗教活动中心便是伊斯兰城市的起源。

由于长期对地区性语言的探询和他们所受的方法论训练，许多欧洲的东方学家倾向于独立研究，从不与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沟通，而这些学者们可能已采取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并研究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和方法，很大程度上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例如，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成了亿万人民的一种精神动力，一种能够通过革命结束旧的不公正社会的力量源泉。在苏联、西欧、美国、中国、印度和世界其他各地，知识分子开始研究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著作，并提出关于经济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一新问题，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无数学者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为了消灭社会压迫和经济剥削，创造一个平等社会的科学的行动纲领的影响。

由于涉及时代变迁和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历史学科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派知识分子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许多左派历史学家也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人类学倾向于研究西方以外的社会群体及其文化，而当时的社会学则着眼于西方，重在研究市民阶层。由于这些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左派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东西方漫长时期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

20世纪20年代后期，少数学者（多为法国人）沉湎于对韦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从而受到了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开始提出了一套新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他们着眼于较长时期而非对个别事件的研究，以求总结出支配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通常以定量方法研究社会史和经济史，相对于主要的政治事件而言，更注重普通人的活动。这些历史学家以“年鉴学派”而著称，这个名称最早见于《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该刊物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于1929年在斯特拉斯堡创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人文社会环境，对中东和北非史的研究逐渐产生了影响。夏尔·安德烈·朱利安于1931出版的两卷本《北非史》，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并带有几分年鉴派学者的思想。与早期欧洲学者的史学著作相比，它不仅包括了北非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而且已不再把欧

洲对该地区的征服和殖民作为研究重心,^①因此,该书是一部内容更广博的著作。

史学研究方法论的不断提高,尤其体现在1940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中。第一篇是《十字军时期叙利亚北部及安条克的法兰克公国》^②,作者是研究中世纪伊斯兰教史的法国历史学家克洛德·卡昂(1909—1991)。另一篇《伊斯马仪派的起源》^③,由研究中世纪伊斯兰和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英国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1916—)所著。这两篇论文揭示出,同样可以用分析欧洲中世纪史的方法,来研究中东中世纪史。卡昂和刘易斯把东方学和更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应用到了他们开创性的研究之中。与刘易斯不同,卡昂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并首先倡导把这一方法引入到中东中世纪史的研究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方法论有了长足的发展,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两人的学生费尔南·布罗代尔,成了法国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布罗代尔在他的力作、发表于1949年的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④,向学生们介绍了史学新概念。像绝大多数年鉴派学者一样,布罗代尔努力解释他的基本范例和史学方法。在其著作的第一部分中,布罗代尔着重论述了地理和气候与人类进化的关系,第二部分论述了各类型社会制度和人类各群体的历史。第三部分运用他在前两部分已建立起来的基本史学理论解释历史事件。与东方学家相比,后者更注重把伊斯兰文明作为一个分析单元,而布罗代尔所强调的是地理单元,就是濒临地中海的欧洲、奥斯曼、北非和黎凡特地区。

20世纪40年代后期,欧洲大陆乃至英国的学者们,开始对社会史和经济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例如,专攻现代伊朗问题的伦敦亚非研究所的英国学者安·兰姆顿(1912—),出版了她的奠基之作《波斯的地主和农民》^⑤,这是专

^① Charles-André Julien, *History of North Africa: Tunisia, Algeria, Morocco,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183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② Claude Cahen, *La Syrie du Nord à l'époque des croisades et la principauté franque d'Antioche*, Paris: P. Geuthner, 1940.

^③ Bernard Lewis, *The Origins of Ismailism: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Fatimid Caliphate*, Cambridge: W. Heffer & Sons, 1940.

^④ 该书1972年出版英文版,中文版见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⑤ Ann K. S. Lambton,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Persia: A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Land Revenue Administ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论中东农村社会经济的第一批著作之一。兰姆顿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所从事的伊朗研究，详细论述了现代伊朗的农村社会和经济关系。

在这期间，在西方各大学从事研究的人数持续增加的中东籍学者，承接了始于 19 世纪的中东研究趋势。1934 年，叙利亚裔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查尔斯·伊萨维（1916—），离开埃及前往牛津学习。1945 年，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西克游学到伦敦，深造于亚非研究所。1955 年，专攻埃及现代史的埃及历史学家阿法夫·卢图菲·萨义德·马尔索（1933—），离开开罗前往斯坦福大学，后来她又到牛津大学从事研究。1958 年，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阿拉伯各省状况的叙利亚历史学家阿卜杜勒·卡里姆·拉菲克，被派往伦敦，深造于亚非研究所。这仅是中东前往欧洲和北非求学的数百位中东历史学家中较为突出的四位，这些中东籍的历史学家希望利用上文所提及的新的研究方法，研究各自国家的历史，以纠正早期历史著作中不符事实的论述。

由于适应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少数欧洲的东方学家逐渐不满足于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就像汉密尔顿·吉布（1895—1971），这位牛津的研究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语言、文学教授，在 1947 年和 1949 年分别出版了《伊斯兰现代趋势》和《伊斯兰教历史概论》。^① 他常表示，希望自己这位被人们所称誉的阿拉伯语言和文学教授，更能接近历史和社会科学。在当时，有这种愿望者也绝非仅他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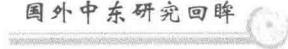
1954 年，在英国的剑桥召开了东方学国际会议，所有与会者都收到了一本名为《东方学与历史》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建议东方学家应把他们的研究领域“置于世界通史中的适当位置”。^② 这本小册包含了五篇文章：古代近东、伊斯兰、印度及其文化帝国、中国和亚欧中部，展示了这些地区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伯纳德·刘易斯用这样一句话作为其论文的开头：“人们注意到，欧洲的阿拉伯历史著作主要由不懂阿拉伯语的历史学家或不懂历史的阿拉伯语学者撰写。”^③ 他在其文中要求更多地利用奥斯曼帝国和中东其他地区的档案材料，要求把“伊斯兰历史与人类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④ 为这次会议定下了调子的

^① H. A. R. Gibb, *Modern Trends in Isl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Mohammedanism, An Historical Surv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② Denis Sinor, *Oriental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 W. Heffer & Sons, 1954.

^③ Denis Sinor, *Oriental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 W. Heffer & Sons, 1954, p. 16.

^④ Denis Sinor, *Orientalism and History*, Cambridge : W. Heffer & Sons, 1954, p. 32.



这本小册子，并无与东方学学术决裂之意，只是为东方学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克洛德·卡昂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他评论说，刘易斯的公开声明，准确地概述了东方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中东方面方法论的根本不足。在其颇有影响的文章《中世纪东方穆斯林经济社会史》中^①，卡昂为东方学家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缺乏兴趣深感惋惜，他解释说，《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一版，在农村生活方面几乎是空白，对工匠和商业活动的论述，也只是凤毛麟角。随后，他要求研究财政制度、土地税收、土地所有者的类型、经济和技术形态文化、城市史、工作的职业和范式以及商业。他认为，中世纪穆斯林社会的大混乱，至少部分地源于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他进一步指出，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能够揭示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对立，或许也能揭示一种阶级斗争。他坚持认为，虽然用于这种历史研究的资料并不丰富，但还是能够找到。例如，卡昂在其发表于1958—1959年的颇有影响的文章《中世纪亚洲穆斯林的民众运动与城市自治》中，认为穆斯林社会的民众运动，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体系中得到解释。

卡昂对许多东方学家的成就并不满意，他认为这些成就忽略了人类群体之间为财富和权力而进行的相互竞争，而兰姆顿、伊纳尔西克和其他学者所从事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有待于深入。

作为对剑桥会议上卡昂这个观点的积极响应，1957年创办了《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他在该杂志的7位编辑中，前两位是克洛德·卡昂和曾求学于奥地利、后移居美国的东方学家古斯塔夫·冯·格鲁内鲍姆（1909—1972），他在该刊的创刊寄语中写到，“正当欧美经济史和社会史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而从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方面研究东方史，仍显得很不足”。^②

《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的创刊，很快引起了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广泛研究，涌现出了大量的专著。1962年，专门研究近代中东史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贝尔，出版了他对19世纪埃及土地制度研究的专著《近代埃及的土

^① Claude Cahen, L' 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 orient Musulman Medieval, *Studia Islamica*, No. 3, 1955, pp. 93-115.

^②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 1, No. 1, 1957, p. 1.

地制度史》。^① 1966 年，马克西姆·罗丹松在其专著《伊斯兰与资本主义》中^②，表现出对经济分析的新的关注。就像该书的书名所揭示的，他把东方学家的研究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伊斯兰”与经济问题。针对某些人认为欧洲（新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不同，它对资本主义情有独钟的观点，罗丹松指出，绝非伊斯兰教有什么特别之处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认为，伊斯兰社会与全世界其他社会一样，当神学思想阻碍经济发展时，就会予以废止或重新改造。

与此同时，各种背景的学者们，对中东历史研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方法。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东方学家，如英国籍的黎巴嫩学者艾伯特·胡拉尼（1915—1993），他曾在牛津研究欧洲哲学和思想史，他对阿拉伯文化颇具鉴赏，并能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向西方读者传递他的思想。在 1962 年出版的《自由主义时期的阿拉伯思想，1798—1939 年》一书中，胡拉尼分析了中东穆斯林和基督教思想家对西方思想的反应和修正^③，详细介绍了 15 位思想家，把他们的观点与西方从政治、经济上向中东的扩张有机地结合起来介绍给西方读者，同时，对其他思想家也作了简单介绍。这是首次把阿拉伯教师、知识分子、政治家和行政人员的思想介绍给西方读者。

与年鉴派学者研究社会史角度不同，胡拉尼的研究着眼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阶层。他后来评述说，在该书中，“对于作为主题的思想运动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不受欧洲思想影响的伊斯兰思想的发展趋势，论述太少。尽管如此，与他后来的其他著作一样，该书提出“从内在理解”来研究中东，其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视角。

使用的资料越新，提出的新问题就越多，也就更有兴趣继续研究中东历史的各个新的领域。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查尔斯·伊萨维出版了他的中东经济史丛书，他的研究几乎完全依靠当代商业、银行和财政档案材料。伊萨维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并未注重“伊斯兰文明”，而是特别强调世俗经济制度及其关系。

^① Gabriel Baer, *A History of Landownership in Modern Egypt, 1800-195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该书 1974 年译成英文出版：Maxime Rodinson, *Islam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4.

^③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